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鄱阳风雨堪追忆？	曾昭奋
【春秋史笔】	林彪：从将军到政客	柳 栋
【劫后反思】	“九一三”使神话破灭	廖振旅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鄱阳风雨堪追忆？

• 曾昭奋 •

（一）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凌晨，毛泽东从上一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动人诗篇。

余江县位于鄱阳湖南岸。这个县有一个区叫兰田坂，“方圆五十里，由于血吸虫为害，在近五十年内，兰田坂有三千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有二十个村庄完全毁灭，有一万四千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的诗作，作为文艺作品，被破天荒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在同一版上刊出墨稿），既为瘟神送行，也为当年掀起的“大跃进”和“个人崇拜”壮了声势。

然而，与毛泽东同样住在北京城的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当他们从十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送瘟神》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特大的喜讯，豪迈的诗情，还有那远未被送走的瘟神，竟也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派“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清华两派的武斗，登上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舞台。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排得满满的，但已经全然流于形式。此时，已有部分教师开赴北京城内外各工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工宣队宣布，在鄱阳湖鲤鱼洲（属南昌县，位于鄱阳湖南岸，靠西；而同样地处鄱阳湖南岸的余江县靠东）建立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对此，已经

厌倦于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教师们，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教职员工，一开始还表现着热情，许多人踊跃报名并立即向鄱阳湖进发。

那时节，我因在“陈里宁案件”中负责《“狂人”日记》编辑工作，又擅自写了一个同名剧本（草稿），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起，一直被审查，被隔离，被批斗，已经一年多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得到下放农场的通知，但没有告诉我，我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是否同时下放。我的妻子也是清华教员，但属于不同的系。当时，她已与所在教研组的教师一起，下放到新华印刷厂劳动。按说，当时的新华印刷厂跟清华大学一样，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抓的点”。她在厂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总比到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有所收获吧。我出身于一个华侨世家。父亲在南洋当小学校长，我在农村长大，当然熟知农业劳动的艰苦。她出身于一个华侨富商家，自幼娇生惯养，对于下放农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她此时也被下放农场，那是受了我的拖累。

那几天，我已准备好一个人去农场的简单行装。晚上回宿舍时，我总是战战兢兢，老远就望着宿舍的窗口是否亮着——如果窗口不亮，就说明她没有从工厂赶回，就说明她不会跟我一起下放。然而，第三个晚上，距动身还有三四天，我老远就看到那窗口的灯光——她从工厂赶回来了，她也要下放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就要被“扫地出门”了。我颓然呆立在路上，好久迈不开步——是我拖累了她。

（二）

到了鄱阳湖，到了农场，从早到几个月的同事们那里首先听到的，是三条不祥的信息。

一是，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血吸虫病致人死命，人民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撤走了全部劳改犯，撤销了农场。而清华大学正好选中了这个地方来改造它的知识分子。

二是，首批来农场的教职工中，已有多人患了血吸虫病（当时叫“小虫病”），有的已经危及生命或丧失了生命。

三是，农场的土地，是围湖造田而成，一旦鄱阳湖春涨，决堤，我们将全都成为鱼鳖。

头两条，血吸虫病的厉害，一时还无法体验。倒是农场领导着意安排新到的一批人马，到堤围上走了一遭。只见堤下有不少临时搭建的茅棚，是被征召来加高加宽堤围的农民们的住所。领队的人告诉我们，加高加宽堤围是为了确保农场的安全，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经费是由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拨给的（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除李先念继续视事外，其他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

这里有血吸虫。

这里没有贫下中农。

在农场，我和妻子仍然分属不同单位（连队）。与在学校时一样，她在所属的单位（连队）继续当革命群众，我在所属的单位（连队）继续被审查。不论我多么狼狈，不论我被宣布犯了多大的罪孽，她都不必为我的罪行表态或参与对我的批斗。阶级斗争的风暴没有吹进我的这个“避风港”。一些被审查、被批斗的对象由于家人参与批判、斗争、划清界线而“自绝于人民”的事，似乎离我十分遥远。

有一天傍晚，繁重的田间劳动结束了，连队组织了一次“车轮战”批判会。革命群众被分成好几个批次，轮番对我进行批判和“攻心”。一批退去了，吃晚饭去；另一批刚吃完晚饭，又来对我“攻心”，好像没有个完。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给我安排吃晚饭的时间。经过白天劳动的体力消耗，又接着这连续两三个小时站着挨批，当“车轮战”结束的时候，我已感到不像个人（深更半夜，一个正被审查批斗的人，当然不敢跑到食堂去要饭吃，何况这时食堂早已关门）。回到集体大统铺宿舍，我连忙从枕头底下取出一把“开口笑”（一种用面粉加糖的油炸小丸子，是从食堂附设的小卖部买来的。不少人都买了这种小丸子，以备肚饥时食用）吃了起来。

这下子闯了大祸！立即被革命群众发现，被揪回批斗现场。……革命群众跟你讲政策，讲前途，你却无动于衷，还吃你的“开口笑”！一时，“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口号声响彻夜空。这一轮新的“车轮战”是临时发生的，似乎不是连队领导出面组织的。夜已深，闻声赶来的革命群众，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似乎没有尽头。

我昏昏沉沉地站着。突然间听吴良镛先生念到最高指示：“……使他成为一个好同志。”吴先生作了什么发言，念了多长的最高指示，我浑然不知，但这最后一句，竟然那么清晰地进入了我的听觉。我真怀疑吴先生一时糊涂，选错了一段最高指示，但既然开了头，只得把它念完。我估计他是中间插进来的，没有经历刚才发生过的愤怒批判和大呼口号的场面。正是一句“使他成为一个好同志”，立时引发我的嚎啕大哭。吴先生原是土建系副主任，他与我同属一个教研组。“文革”开始时，他与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一样，被作为反动权威批判过。举家下放农场之后，境况好了一些。但他为什么这么糊涂，选错了一段最高指示，敌我不分呢？我虽然从未萌发过“自绝于人民”的念头，当时也不知自己是否或如何“成为一个好同志”，但吴先生这一次“疏忽”，却令我终生难忘。他是我到农场之后第一个施恩于我的共产党员。

（三）

到鲤鱼洲农场不久，妻子即查出身怀六甲。其后，差不多一个月之内，由妻子带头，全农场一共有四位母亲产下了五个婴儿。我们的小女儿取名“洲子”，有另一男婴取名“小鲤”，算是对鲤鱼洲的一种纪念。

一九七〇年夏天，妻子产前一个月，鲤鱼洲遭遇一次龙卷风的袭击。风灾过后第三天，正逢休息日，连队里的干部告诉我，我的妻子和女儿所住的茅棚当夜被龙卷风刮倒，但未伤人。连里特准我前去探望。妻子告诉我，当夜倒塌下来的房架正好被一个矮衣柜拦住，没有砸着人。当她们被压在废墟中时，她听到外面有一位男教师高声喊道：“这里房塌啦，下面埋着一位孕妇呀！”

妻子曾向工宣队提出申请，让她回到我的老家广东农村去生产。工宣队没有批准，反问道：“难道在农场就生不出小孩吗？”

妻子产前两三天，我和妻子、女儿又组成一个小家庭，住进了一间刚刚盖好的泥墙、泥地、瓦顶的宿舍。负责拉电线的一位女教师特别提前为我们家拉了电线，装了电灯。她对我妻子说：“要是夜里临产，黑咕隆咚的怎么行。”临产当天上午，助产的医生被从水田里请来。当她背着医疗器械包匆匆走进我们家时，腿上的污泥还没有洗净。她打开了从北京校医院带来的“产包”，一时惊呆了。经过鄱阳湖潮湿空气的侵袭，助产用的剪刀已被锈住，打不开。匆忙中只得用妻子这几天在剪尿布时使用的剪子。这导致了严重的感染。妻子发高烧，流脓，痛苦不堪。大夫给了一些消炎片和冲洗的药水。但我仍然必须照常出工。白天

里，照顾刚出生的婴儿，照顾自己的病体，全由妻子一人负担。过了几天，一个清晨，连长王景厚（与我同系——土建系的教师）来到我们宿舍，看望了产妇和婴儿。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星期就不用出工了，好好照顾她。”这位好心的王景厚，他是我到农场之后第二个施恩于我的共产党员。

妻子产后，她原来所在教研组的几位教师，按照北京人的习俗，给她送来了一只老母鸡。那时，两个星期安排一个休息日，一般教师可以到南昌市内去采购急需的东西，或改善一下生活。正在被审查、时不时受批斗的我，就没有去南昌市的权利和机会，也就无法为妻子和小女儿去采购任何东西。妻子产后有疾。小女儿营养不足，到半岁时脑壳上还没有一根头发。正好她半岁生日时，我胡诌了一首七律，“颈联”云：父是待罪心有鬼，汝何择胎眼无珠。

这个刚出生的女婴，显然跟她的母亲和姐姐一样，也受到我的拖累。

她们的遭遇和命运，竟使我在这段特殊的日子胡思乱想起来——当一个民族遭受苦厄的时候，它的女同胞们要经受比男人更多、更深的苦难。

——我五六岁（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时，有一阵子，日本鬼子发动了对邻村的一轮大烧杀。男人们闻讯外逃，终于逃出来小部分人，幸免于难。而妇女们认定，如若逃跑时不幸落在鬼子手中，将遭受更惨痛的欺凌和蹂躏，她们躲在家中，躲在床底下，终被活活烧死。

——文化大革命中，引起我这种胡思乱想的事情更多。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清华园里即掀起了“红色恐怖”。一天夜晚，五六个身强体壮的男学生，正拖着一位女教师，从建筑馆（清华学堂）拖过了新水利馆，正向图书馆的方向走去。一群学生跟在后面，或怒斥，或高呼口号。那位被拖着的女教师，以为大祸临头，凄厉地喊着：“我是×××！我是×××！”她是土建系的一位班主任兼政治辅导员。那时，校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已被打成“黑帮”，困在高教部接受批斗。学生们则把对“黑帮”的愤怒发泄在这位女政治辅导员身上。

——文革初起时，土建系一位正被批判的女教师（也是系干部），被安排打扫清华学堂的厕所，连男厕所也归她一个人打扫。上班时间，男厕所正常开放使用——这显然是一种故意为难、侮辱她的安排。整人之术，登峰造极！

——一九六八年清华两派武斗期间，一位被武斗一派关押、隔离审查的校党委女干部，为抗议看守者的非礼和凌辱，愤然跳楼，一时未即毙命。看守者将她抬上汽车。可能她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看守者会给她改名换姓，把她的尸首丢在医院，一走了事。于是，她用尽了生命的最后力气连声喊着：“我是×××！我是×××！”“四人帮”垮台后，学校为这位女干部补开了追悼会。

——在农场清查“五一六分子”期间，有一次，我听一位姓徐的副连长叙说他的一个设计：“我们在水田里架搭一个窝棚，就将她（被当作“五一六分子”正被隔离、被批斗的土建系的女教师陶德坚）锁在窝棚中，大小便就撒在水田里。”令我震惊的，倒不是他的这个设计，而是他讲述这个伟大发明时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和腔调。

——在大田劳动时，时不时会有人因劳动过累昏倒田头。昏倒者会立即被人抬走。我曾注意到一个情况：如果昏倒者是位男士，就只有两个人抬着；如果是位女士，就有四个人

抬，似乎是对女性的特殊照顾。当场昏倒的，女的比男的多。有一次，几个教师跟一位工宣队员谈到有些教师在劳动中昏倒的情况时，那位从来不下水田劳动的工宣队员说：“还没听说有人当场累死的。”

（四）

农场里没有贫下中农，教师们用不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只有两次见到一位老农。他是工宣队从附近农村请来的一位顾问，是农场安排农时的参谋。

插秧时，时不时有人带头，大家跟着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唯恐落后，一两个小时不敢直一次腰，待到了田头，一个个都瘫倒在那里，获得短暂的休息。那位老农，看到这种情形，颇为同情地说：“我们（农民）干活也没有这样拼命的。”这位老农用了“拼命”这个词语，用得真好。在农场里，这等“拼命”的场面多着呢。

——农机系有一部大马力的苏制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它也下放到农场来，但没有下田参加收割，而是在晒谷场上专司脱粒，张着大口吃大伙割下来的稻捆。我们八九个壮劳力，使出最大的力气，用最快的速度大捆大捆地往那个大口里送，都无法满足那个“血盆大口”的需要，那么强力而持久的劳动，却未有一人昏倒。

——我们一支劳动队伍正走在一条泥泞的田间道路上，一些女教师已摔倒在泥泞中，队伍几已寸步难行。路旁正停着一部推土机，在大家招呼下，开推土机的教师把推土机开了过来，把一段泥泞推掉，露出了干硬的地面。正当大伙欢呼着开路时，一位干部走了过来，制止了推土机的动作。大伙敢怒而不敢言。革命化战胜了机械化。

——建仓库砌山墙时，由于山墙很高，砌墙的支撑和脚手架又马马虎虎，砌到三四米高时，墙体和脚手架一起倾塌了下来。但这一次未有人受重伤。大家都暗自庆幸，是神明庇护了我们！

——夜里，鄱阳湖边来了几个大木排（说是来自井冈山，增加了木排的神圣含义）。灯光很暗，大伙从湖面上将木头扛上岸。若不慎滑落湖中，身体钻到木排底下，那是必死无疑。但在劳动一宿之后，大伙都安然返回宿舍。实际上是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位副连长（教师）肩扛一根大杉。他的后边不远处是另一位扛着大杉的教师。由于大杉很沉，又扛着走了很长一段路，副连长肩上的大杉骤然跌落下来，差不多就要砸在后边那位教师的脑袋上。副连长在大杉跌落的瞬间回头一看，脸色已经煞白。一场大祸悄然退去。（“文革”结束后，这位副连长不再待在清华，也许正因为这一特殊经历曾令他心灵不安而选择了“离开”。）

艰苦的劳动，“拼命”的场景，是可以见到，可以感知的。而那肉眼看不见的血吸虫和致命的“小虫病”所造成的烦恼和威胁，却是后续的，更为可怕的。

在水田劳动之前，大伙都在手上、臂上、脚上、腿上涂一层二酞酯溶液。按理须待溶液风干、形成一层保护膜之后才开始下水田劳作。但刚涂完溶液，就有人立即喊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溶液未干，就纷纷下水田干活了。

“贫下中农的皮肤比我们厚，不怕小虫。”

“水牛皮更厚，小虫照样钻了进去。”

紧张劳动之际，这样的谈笑，似可轻松一下。

“工宣队的李师傅，有老寒腿，不能下水田。”

“军宣队的小王，天天轮着值班，从来不参加劳动。”

听到这样的议论，则轻松不起来。

春汛时节，鄱阳湖水涨。鲤鱼洲的土堤，虽经加宽加高，仍有溃决之虞。这时就会听到窃窃私语：“（工宣队的）李师傅和小王回北京开会去了。”

艰苦的劳动、险恶的环境，是专为改造“臭老九”准备的。

（五）

四十年前，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一群“臭老九”，曾在鲤鱼洲被改造着：

一、谢祖培（一九〇一——一九九〇）

一九二七年获德国卫兹堡大学外科医学博士学位，我国著名腹外科专家，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二年来清华，任校医院院长，在鲤鱼洲农场时已年届古稀，很少见他参加重体力劳动，也没有让他当医师。有一次，我痔疮发作，私下求他给点药物。这位好心的外科大夫从他床头取出一瓶碘酒，要为我涂抹患处，吓得我落荒而逃。

二、刘弄潮（一九〇五——一九八八）

一九二一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在武昌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曾代表党组织与鲁迅交往。一九五二年来校，主持创建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在研究李大钊生平和思想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五七年当了右派。我在农场中始认得这位老人。当时他已显十分衰老，成天佝偻着腰。大伙好像都很关注他，有人说李大钊是他的革命引路人，有人说李大钊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有人说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三、黄万里（一九一一——二〇〇一）

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伊利诺大学分获硕士、博士学位。一九三五年回国，投入长江水文水利研究工作。一九五二年来校。一九五七年因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和发表随笔小小说《花丛小语》而成为清华的大右派。在农场，仍戴着右冠的六十岁的黄万里，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把从北京带来的自家的自行车改装成运土工具，却横遭批判，说他躲避艰苦劳动，抗拒改造。这位国内国际有名的水利水文专家，在清华却一直不是博士生导师。

四、周卜颐（一九一五——二〇〇四）

一九四〇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以自己当建筑师所得，自费留美。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获伊利诺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科学硕士学位（当时美国未设建筑科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回国。一九五〇年应梁思成先生之请来清华任教。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身心备受打击，神形衰颓。戴着右冠下放农场，已无力参加体力劳动。“四人帮”垮台后，获摘帽、改正，身心奇迹般得以康复。但因年过花甲，学校安排他退休。他不愿退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继续工作（主要一个理由是：回国之后，只干了六年），获得邓大人支持，后赴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和《新建筑》杂志，晚年间获得学术、教学工作大丰收。

五、汪坦（一九一六——二〇〇一）

一九四一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是美国建筑大师赖特（F. L. Wright）的及门弟子。一九四九年初归国，进入东北解放区。一九五七年来校，任建筑系副系主任和建筑设计院院长。“文革”初期被打成美国特务。在农场，这位五十多岁的老教授跟年轻人一样，什么样的苦活都拼命地干，不敢有半点怠慢。“四人帮”垮台后，创办了《世界建筑》杂志，任社长。创办了深圳大学建筑系，兼任系主任。主持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和“西方建筑思想译丛”出版工作。他是马思聪的妹妹、钢琴家马思聪教授的丈夫，一生与音乐结缘。他的家既是建筑之家，也是音乐之家。

六、高景德（一九二二——一九九八）

一九四五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一年留苏，当研究生。那时候，留苏的中国研究生在毕业时都不给学位，但他因毕业论文水平出众被第一个授予博士学位。一九五六年来校。在农场，我未见过高景德。农场撤销后，他被安排在校内的建筑工地上当壮工。劳动中，经常见他同伴谈笑风生，未以为苦。打倒“四人帮”后，任副校长。一九八〇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任校长。

七、周寿宪（年齿不详。生于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一九五〇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两位研究生（都是中国学生）之一，计算机专家。一九五五年回国，同时在清华和中国科学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去中科院工作，专在清华任教。在鲤鱼洲农场，大伙都知道有一位教授被叫做“观察家”，这位教授就是周先生。到农场之后，他只看（观察）别人劳动，自己不劳动，坚决抵制劳动改造，遭到残酷对待。有一次，只见他被几位同事连推带打押到田边，他宁可躺在泥水中，拒绝参加劳动，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回（国）来，不是来参加劳动的……”有人当场痛斥他，有人说他有精神病。鲤鱼洲农场撤销后，他也回到北京，不久即被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在清华大礼堂为周先生补开了追悼会。有人说：“如果他当年留在中科院继续搞他的计算机，不来清华，就好了。”有人说：“如果他当年留在美国，就好了。”

八、郭道晖（一九二八——）

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电机系，与朱镕基同班，是朱的入党介绍人（郭、朱两人一九五七年都被打成右派）。毕业后留校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一九五三年参与创办校报《新清华》并任主编至一九五七年。当年清华党委十五名常委，有四人应声落马（占百分之二十七），成为右派分子，他是其中之一。下放鲤鱼洲时，时在建筑科学院任职的夫人张静娴未同时南下。张大姐，共产党员，一九五三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郭戴上右冠后，她对郭说：“我深知你是好人。我不会跟你离婚。”叫丈夫放心。“文革”结束后，回清华任教。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当我在《世界建筑》杂志任主编时，她曾是同事。晚年的郭道晖，得以发挥所长，从事立法和法学研究，出了二十多本书，成绩斐然。

九、刘鸿亮（一九三二——）

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清华土木系，留系当政工干部。“文革”初期曾被当作“走资派”，与梁思成先生一起被强制穿上清朝官服游街示众。在鲤鱼洲农场时任副连长。“文革”后离开清华，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奥运会前夕，他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刘长春（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后人的双重身份赴奥林匹亚点燃圣火。有人说，如果他继续留在清华，继续当他的政工干部，就不会有现在的学术成就了。

十、钱易（一九三六——）

一九五六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一九五九年清华土建系研究生毕业。聪慧过人，是陶葆楷教授的得意门生。在鲤鱼洲，有一回，连队里突然批判钱穆。作为钱穆的女儿，她只能表态与父亲划清界线。改革开放之后，她赴荷兰留学，从荷兰赴台省亲（据说她是第一个赴台省亲的大陆人）。父女情深，在台湾传为佳话。二三十年来，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和推进，并积极参与社会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我来自广东农村。祖母和母亲的外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在亲戚和同乡中所接触的贫下中农、雇农和穷苦百姓，不比我所接触的“臭老九”少。

他们之中，有一生未穿过鞋、贫病而终时才第一次穿上鞋（为死者入殓时专做的很薄的布鞋）的表叔，有醉心于潮州音乐、却一辈子也买不起一件哪怕很便宜的乐器、无钱医治而死于癌症的舅舅，有在1942—43年死于大饥荒中的许多邻居和小朋友，有一字不识但在文革中被选为村中小学校长的贫农表舅，有雇农出身、当了民兵队长的近房堂叔，有当了生产队长、支部书记但在1958年大跃进时在全县生产会议上拒绝虚报亩产8000斤（当年实际产量是800斤，已属大丰收）而横遭批判、差点丢了官的邻居大哥……

这是我所接触过的两个不同的人群。

前一群人，得天独厚，有机会攀上知识的高塔，以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国为民，并没有看不起下层百姓的恶习。他们曾被完全丑化，被彻底否定，或者被迫否定自己。一旦拨乱反正，他们又站了起来，重新上路，重现生命的尊严和光辉。

后一群人，曾长期忍受着贫穷和文盲的痛苦与无奈。但即使在土地改革高潮中，我也没听说“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曾被动员起来专前一群人的政，改造前一群人。如今社会转型，他们的后代却有机会选择了前一群人的道路，参加到前一群人中来了。

前一群人越来越多，后一群人越来越少。知识可以卖钱，“改造”却没有多少市场了。

至于我自己，不论是曾经的自觉的改造，或是低头认罪的被改造，包括在鲤鱼洲农场的被改造，都只留下记忆或伤疤。

记得一九七〇年秋，全农场掀起“抓516”的高潮。负责审查我的人多次向我交代“坦白从宽”的政策，要我坦白交代参加516反革命活动的罪行。有一天，他们警告我，

农场要开“宽严大会”，就看你的态度，何去何从了。当天晚上，全农场真的开了一个“清查516反革命分子宽严大会”。工宣队的头头在主席台上宣布了宽严政策，马上就有人上台坦白，说自己是516……。紧接着，头头高声大喊：516反革命分子们，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刹那间，全会场的人群中，突然站起来成百个“516”，表示坦白、投降。此时，我也老老实实站了起来，低头认罪了。不一会，就听到那位头头点了八连（土建系在农场的教职工和家属组成的连队）的陶德坚和王某某的名，怒斥他们还不站起来，向人民投降……顿时，全场响起了“陶德坚，站起来！陶德坚，站起来！……”的喊声。

据陶德坚在《风雨人生》（1997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书中的回忆，农场撤回北京后，在一次大会上，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胜利结束，并宣布给陶德坚戴上“516反革命分子”帽子（清华大学唯一的“516分子”）。

回想农场清查516的这场闹剧，以及自己在那场大会上的亮相表演，似乎表明了：自己并不是在运动中改造好了，而是在运动中学乖了，懂得如何来对付、如何做表演了。

说实在的，对鲤鱼洲农场的艰苦劳动，我并不害怕。但我已经成为行尸走肉，想起那些贫穷的、饿死的人们，想起抗战期间侨汇断绝而挨饿的日子，想起大跃进后期粮票紧张、闹浮肿的大学生生活，而在鲤鱼洲，白米饭却可以敞开肚皮吃，这就满足了。即使永远在这里待下去，我也消受得了。只是因为拖累了妻女而负疚。

近年来，随着阶级斗争风暴的渐渐远去，陆续听到几位老先生站出来说真话，说思想改造真把人改造好了是不可信的事。我虽然有时也处于麻木状态，但也渐渐地认同了这种说法。

按照思想改造的理论和目标，鲤鱼洲的艰苦环境，正是“臭老九”改造思想的最佳场所。事实上，也只是像唐僧要改造孙悟空一样，念了一些“紧箍咒”而已。

记得当时有一位校级干部，来到农场视察。他是校里的一位工人，全校有名。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几位教师间，平易近人，很好交流。一位教师跟他取经，说，我们要提高路线觉悟，自觉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要紧跟……但就是提不高，还站错队……他说，我们是工人，一无所有，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用解说，不用思考，自然而然就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走后，我们才议论开来：无论我们怎样改造，怎样努力，怎样拼命紧跟，也不会有什么路线觉悟了。

那时候，“路线觉悟”（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比“阶级觉悟”还要高级，还要值钱。

（六）

当鲤鱼洲血吸虫病致人死命时，清华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信件被转回清华，进行批判。有人说，鲤鱼洲农场得以及时撤掉，是因为当年傅作义将军病重，周恩来总理前去看望时，傅作义将军的女儿直接向总理反映了有关情况。

一九七一年秋天，清华大学决定撤销鲤鱼洲农场，但这一消息并未向群众和我们这些仍被审查、批斗的“分子”们宣布，农场的一些土建工程还在继续施工。五七道路，还将继续走下去？不久，大队人马就撤回北京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已回到清华，我则继续留

下，接受审查。她们回去后的情况，我并不清楚。又过了些日子，宣布留下来的人，全部撤回。

返京时，在火车上，我们这些仍被审查的人，每人都有专人看押着。看押我的是土建系的邓老师和江老师。车到上海站，差不多要停留一整天时间，邓老师就下车进城去了，就剩下江老师还看押着我。我斗胆跟江老师提议，请他跟领导说，让我们俩也离开车站，到市内看看。“上海你熟吗？”“我来过两次上海，是当学生时到上海来实习……”江老师真的去说了，并且获得批准。

走出火车站时，我看见土建系一位年青职员（此时他也被当作“5 1 6”分子，被继续审查，也有人看押着），就站在铁栅栏一边（火车站的里边）。铁栅栏外，则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他是上海人，这是一家人在上海火车站铁栅栏内、外的一次特殊的见面和聚首。当时，电话很难打，又没有手机，这一家人是如何做到能在此时此刻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会见呢。我既为他们的会见感到悲哀，也为自己竟能“自由”地走出车站而庆幸……。

我和江老师在外滩漫步，我向他介绍外滩的许多著名的建筑的历史，他听得津津有味。进入黄浦公园时，我故意在门口站住了。我对江老师说：当年，帝国主义者就在这里贴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我说这话时，自然流露出一种感情，并见到江老师的脸上也表露了一种很严肃的神情。这时，我已全然忘却我俩之间是“看押”和“被看押”的身份了。——这一特殊经历令我无比宽慰：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民族，这种感情并没有因为历经三年多的批斗、审查而改变……。

回到北京，回到清华园时，已是黄昏时分，一起回来的教职工和家属们已经回家，我们一群仍被审查的人则没有被允许回家，就坐在大礼堂前的空地上，等待着如何发落，是集中关押、审查，还是……？最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回“家”，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新斋……。

从鲤鱼洲回来，已经四十年了。有关血吸虫病的悬念和困扰，却没有止息。

记得二十世纪末，有一次到日本福岛县参观某著名建筑，在那里得知，该地盛产大米。有水稻就有水田。日本有不少地区有血吸虫。我问一位建筑师：“这里还有血吸虫吗？”“有！”“农民还下地吗？”“还下地，但现在的防护和装备比以前强多了。”这位建筑师毕竟不是种田人，也说不出更详细的情况。

“听说咱们治疗血吸虫病的医术，比日本要落后三十年。”这是四十年前在鲤鱼洲听说的闲话。所谓“落后三十年”，当年好像是一个常用语。究竟是二十年或五十年，并没有认真计较。四十年（比三十年要长）过去了，也不晓得如今的差距如何了。

当年，我是被确诊的病人之一，曾经通知我半休（但我在几年的体力劳动中一直坚持全时上班）。校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的肝功能已经不正常，经受不了治疗的药物的强烈副作用，所以没有让我就医。建筑系一位与我同龄的教师，身体很棒，就医之后，得了心脏病，一直全休。同事们说我“因祸得福”。

二〇〇〇年前后，由于校医院大夫们的建议和争取，凡去过鲤鱼洲的教职工，每年每人可从学校财务部门获得一百元的营养补助。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一百元的价值已经大不如前。这时，又有传闻，某单位去过鲤鱼洲的工宣队员工师傅，他们得到的营养补助要比清

华多得多。于是，有人发起一次签名活动，要求提高补助的金额。许多人都签了名。我从外地回到学校时，有人就告诉我这签名的事。当我找到一位曾负责征集签名的老职工时，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顿时脸色如土，好像干了一件丢人的事，马上躲开了。显然，签名活动被制止了。要求增加营养补助的事，也再无人提起了。

近年，也有清华人旧地重游，到过鲤鱼洲。据说，清华撤走以后，鄱阳湖的堤围还真的溃决过。那里的血吸虫病并未绝迹。由于消灭钉螺的“人民战争”不复昔日规模，钉螺（血吸虫尾幼的寄体）的繁殖也更令人担忧。农场旧地，已有农民长期居留。农民只有稻米一项收入，仍处于困难境地，小学和托儿所，也亟待外界施以援手。

读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在这部二百八十万字的志书中，关于鲤鱼洲，有这样一段：“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工宣队宣布建立鲤鱼洲农场。五月初，首批三百九十八人去鲤鱼洲。先后有三千多名教职工和家属被送鲤鱼洲农场劳动。农场有农田九千三百亩，原为劳改农场。教工及家属们农忙季节每天要在烈日下强体力劳动十多个小时。地处血吸虫重疫区，致使大批人染上血吸虫病。当年已确诊七百四十七人，怀疑待查者一百一十一人（迟群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情况时，将人数分别改为二百四十九人和八十五人。——原注）。一九七一年十月，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过问下，全部从鲤鱼洲撤回。”

所记时间是准确的，一共是两年又六个月。然而，因血吸虫病而死亡、致残、全休或半休的人数，则还没有透露。鲤鱼洲的历史，还有一部分，被有意遮盖着……。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日动笔，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一稿，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定稿

北京清华园

〔作者简介：曾昭奋，广东潮州人，1935年生，1960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到清华大学任教。〕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春秋史笔】

林彪：从将军到政客

• 柳 栋 •

在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无疑是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林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城府极深。

而林彪，又是其中人格最为复杂、谋略最为老辣、心机最为深曲者，其终局也最为惨烈。

可以说，在中国红色革命的波谲云诡的历史舞台上，唯有他成功地“忽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尤其是“忽悠”了那位被他一手捧上神坛的“红太阳”。

还是他，最终以自身和妻儿的折戟沉沙焦皮烂肉，导致“文革”这场弥天盖地的巨大神话，轰然坍塌。并予以“四个伟大”者致命性的一击。

林彪——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位历史角色的呢？

简而论之，林彪的一生，即是“从将军到政客”的角色转换。

在这里，先得简单定义一下“将军”与“政客”的内涵：

“将军”者——借用《论语》“仁智勇”三字概括，足矣。“仁”：仁心也；“智”：谋略也；“勇”：勇气也。三者合之，可谓仁德将军，可谓真将军也。三者缺一，则为残将军也（残：残酷，残缺之意。）。以“仁智勇”作为衡量标准，也完全符合当代社会对于一名现代“将军”的评价标准！

“政客”者——则缺乏信念，理想，行为底线，人格准则；为了个人的私欲私利，不惜损害乃至葬送公共利益与崇高信仰。

（“政治家”的境界则与“政客”截然相反——他们具有信念，理想，行为底线，人格准则；有为公共利益与崇高信仰，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道德勇气。）

由以上两种定义观之，“将军”与“政客”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而林彪却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难度极大的转寰。是什么样的内因与外因，促使了他的“华丽转身”、脱胎换骨？正为本文所要探讨的。

甲、对“将军林”的评判

笔者以为，从林彪投笔从戎（1925年，18岁）到1957年，林彪是以“将军”的角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1，投身黄埔军校——怀报国热忱，救世情怀；

2，“南昌起义”——有理想信念，献身精神；

3，要毛让位——遵义会议后，因战事不利，上书要求毛泽东让位彭德怀。直言不讳，军人气质；

4，长征鏖战——战功卓异，历练成将（属于内战）；

5，“平型关”一战——民族气节，军人本色。但是，称此一战为“平型关大捷”，则过于夸张。“大捷”一说，实为夸大宣传之词。根据现有史料看：歼敌六百（而非当年宣传的一千或两千），我方伤亡一千五百余人。这本是一场居高临下的伏击战，打的又是日寇的辎重大队，并非主战部队。结果如上，很难说是一场“大捷”。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连林彪自己也从不炫耀这一场战斗。这一场战斗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一种民族精神的张扬，一种不屈军魂的体现。那时的林彪和那些洒血疆场的战士们，无疑是民族英雄；而抱着牺牲老战士的遗体大哭的林彪，也可称作一位“仁德将军”。

6，“延安整风”——从个人掌握的有限资料看，林彪在这场残酷政治运动中是清白的，没有像某些老红军那样，无情地摧残了许多投向延安的知识青年。

7，东北战场——这是林彪作为“将军”生涯中最为出彩的时段；也是“拥林者”们最好津津乐道的华彩乐章。将其誉为中国军队的“第一战神”，并好借斯大林，蒋介石之口，极尽赞美之词。

笔者则认为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此际的林彪已不再是一位“仁智勇”三全的“将军”了。

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职业军人，有两条铁律必须遵循：a)尽可能的减少我军的伤亡数字；b)尽可能的减少平民的伤亡数字。

林彪在攻打四平等战役中，曾采取人海战术；在塔山阻击战间，他的那句“名言”：“我不问伤亡，只问阵地能否守住！”都是不计伤亡数字的战法！

至于在长春围困战中，饿死了十几万或三十几万的长春百姓，更是一种不齿的行为！（拥林者”们，将责任完全推到遥在远方的最高指挥者身上，难以服人。林彪作为前线的第一总指挥，对于战略战术的制定、贯彻、完成，没有他的谋略和首肯，岂能出台与实施？怎能将其罪责一推干净？）

不要用什么“为了伟大的解放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云云，作为饰美之词。笔者只关注那些无辜的长春百姓的饿殍遍地与悲惨死状（可参考龙应台的有关文章）。

“拥林派”的歌德者们，应该查看一下刘伯承元帅是如何看待这场残酷内战的——内战的双方都是中华儿女，都曾是抗日战场上的热血男儿，却为了某种主义而视为仇寇，相互绞杀。这分明是一场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不仅是生命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政治思维的悲剧。只迷信“枪杆子”是解决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数千年来，执迷不悟！若说那个时代的人有所局限；那么今日的玩笔杆子者，还在大书特书，更是可耻不堪了。

8，朝鲜战争——林彪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今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评价：一者认为，林彪胆小怕事，没有胆量与美军对抗。故而借疾患之名，逃避主帅之职；

另一种看法是，林彪的态度是正确的。刚刚建立的新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全副精力地进行建设事业。从今天看，当年许多领导人的同类观点是合理的。尤其在看到金氏家族在北朝鲜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人感到，为那么一个政权牺牲几十万的中国军人，毫不值得！

但是，当我们评判历史事件时，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与人心向背，做出“事后诸葛亮”式的价值判断。50年代初，受尽西方列强羞辱的炎黄子孙，头一回敢与世界上的头号强敌交手（连苏联老大哥都不愿招惹“美帝”），令那一代的中国人充满了“豪情壮志”“牺牲精神”。想想那时候，有多少海外学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返回故土，报效祖国（至于他们之后的命运如何，另当别论。）。林彪，身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职业将军，怎么能够临阵退却呢？

至于说到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很对！不过，笔者想问一句：抗日战争结束后，是不是更需要解甲归田，重建家园？可那时的“将军林”却欣然奉命，奔赴东北白山黑水，是在华夏

大地之内啊；而朝鲜战争毕竟发生在疆外。内战与外战，哪一种战争给本民族带来的损失更大？！

难道不是“将军林”的心底有点发怯吗？另一佐证是：1958年，叶飞奉命炮击金门时，收到林彪的一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对美稍加暗示”，当时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此事可以证明，林彪在面对“美帝国主义”时，是万分戒慎的！

其实，这种反应很正常。世人皆知：国军与美军的战斗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共军的军事装备，更是无法与美军相提并论。

面对艰难时局，彭德怀将军却做出了不同的抉择——临危受命，赴汤蹈火。这才是将军本色！（彭德怀并非鲁莽之将，朝鲜战争的每一场战役，他都打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相形之下，林彪的表现，是否为之逊色呢？他是不是担心，若是在朝鲜战场上铩羽而归，会毁掉他的“战神”英名？所以，他选择了退隐。

事实也是，从朝鲜战争起，林彪便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按毛泽东的话“领退休金去了”）。从他的表现看，能否说：林彪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内战英雄？他的“卓越战绩”，显然是建立在内战上！

“领退休金”的林彪，只是身退而心不退；正是在他长达9年（49年——58年）的“退隐”期间，完成了“从将军到政客”的蜕变过程。1958年庐山会议上，当他再次“偶尔露峥嵘”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已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诡异政客了！

## 乙、对于“政客林”的评判

他是怎样完成这一场阴鸷而又吊诡的人格嬗变的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现实政治的残酷教训——1）斯大林的大清洗。1938年，林彪去苏联养伤，必然耳濡目染到大批苏军的高级将领被无情清洗的信息（斯大林的大清洗正发生在1934——37年）；2）延安整风。这场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严厉整肃，伤害了许多无辜者，包括他的未来夫人叶群；3）高岗事件。高岗曾经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老同事。他的自杀结局，定会令许多的老战友为之寒栗；4）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撼了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会根据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人生哲学，做出不同意味的理解。

这些层层叠叠的血腥阴影，必然在林彪的那颗极为敏感又极为精明的心灵上，产生带有黑色毒素的发酵作用。

二，古文化权谋之术的丰沃土壤——两千年前，龙人便具有了两种精神性的早熟：一是哲学上的早熟——当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皆在膜拜各色各样的“拟人化”之神明时，我们的先哲已经觉悟了“无为大道”的至境；另一是政治权谋的早熟——只需看看以下书名就足以令人毛发倒竖了：《鬼谷子》《韩非子》《孙子》《战国策》《六韬》……

源远流长的传统政治文化，为权术家们提供了极其丰盛的黑色养料。

故而在中国政治史中，将“兵法”转寰为“权术”，有如行云流水般地顺畅。兹举几例：《孙子·始计篇》“兵者，诡道也。”改一字，则为“‘权’者，诡道也”。《军争篇》“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改一字，则为“‘权’以诈立，以利动……”。《九地篇》“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只需将“将军”改为“政客”，则全为权谋之术矣！

而从“将军”转身为“政客”，亦是一桩易如反掌的买卖。远观曹操，近看袁世凯，可证（曹、袁二君，无不精通古人兵法）！而林彪的政治人格，比他们更加地阴曲，晦暗，畸形。缘由如下——

三，极为病态的身心状态——病态的身体状态，必然影响人的心理状态。那一颗误伤“将军林”的子弹，真可谓是冥冥上苍的一种恶意一种歹毒。不仅对于林彪来说，是属于精神性的致命一击；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也是一场带有浩劫意味的致命内伤。

正是这一枪，迫使“将军林”成为了日日龟缩于幽暗密室内的“隐形人”。一个整日不敢沐浴阳光、和风、鸟鸣与音乐的孤僻者，其心灵会是光明正大浩气长存的吗？何况他朝朝暮暮所琢磨的是古今权术，中外谋略；并且苦费心思地揣摩那位指点江山翻云覆雨的“当代秦始皇”的微妙心态（毛以此而自傲：“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曰：‘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病态的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病态的古老政治权谋文化——病态的身心状态”，三位一体，互濡互染，相滋相润，毒化日盛，终于孕生出了人格晦暗的“政客林”。

若是在数万个汉字中寻找出一个最为精确的字眼来描绘“政客林”的性情，再没有比“阴”字更为贴切的了！

为龙文化权术之祖的《鬼谷子》之《摩篇》曰：“圣人谋于阴……”《鬼谷子·谋篇》：“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圣人之道阴”；《孙子·军争篇》亦曰：“故兵以诈立……难知如阴。”（而所有与“阴”字相关的汉语词汇，几乎都是贬义词——“阴鹭”“阴毒”“阴狠”“阴险”“阴森”“阴霾”“阴惨惨”“阴凄凄”“阴谋”！）

由兵法家转身为权术者的林彪，在玩阴招上，无人能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阴谋大家”。整日隐匿于密不透风、不透光、死寂无声幽穴内的“政客林”，只会孽生出晦暗的“古V心态”。也正是这种鬼蜮心机，才会令他透骨透髓地领悟古老东方权术的“真谛”！

自庐山会议出山后，从外表看，林彪对毛亦步亦趋；实质上，“伟大领袖”早已坠入了林的“飞钳之术”，浑然不知（至少是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

所谓的“飞钳之术”，按《鬼谷子·飞钳篇》云，即“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间以箝之……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于人，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陶弘景的注释最为精当：“内惑而得其情曰钳，外遇而得其情曰飞。得情则钳持之，令不得脱移。”

已觊觎透彻毛的内心隐欲的林彪，刻意地投其所好，除其所恶。并且形成了无人能敌的“林氏风格”的政治语言——他一开口，便言辞犀利，所向披靡。无不入木三分地领悟圣上的深曲心意，又无不一语中的地致领袖的怨敌于万劫不复之地。

此等语言，来源于他匠心独运的“林氏腹稿”。所谓的“林氏腹稿”，指的是林彪有一套非常独特怪异的读书（文件）、思索、揣度政局与领袖心态的方式（详情可阅其秘书李文甫等的回忆录）。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隐在古 V 一般幽暗的卧室书斋内，林彪将战场上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深厚功力，转化到了政坛的勾心斗角上。极为精明的审时度势、设局布阵。

自 1959 年至 1966 年，他的几次重要表态，都是精心构想深思熟虑的“旷世杰作”；都对政治的畸形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是一锤定音的作用。

他那用心极深的数篇讲话，足以为某些领导人的政治命运定性，或是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前景定向，或是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神话定调！

#### 一，为政治人物定性——

1959 年，庐山之巅，“政客林”华彩亮相。他一开口，便锋芒毕露，一剑封喉——给彭德怀的“政治问题”定性：“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在那个阶级斗争至上的年代，他的定性之言，足以致任何人于死地。

接着他巧妙地奉承最高领袖：“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氏风格的语言特征从此彰显：在致“政治敌手”于死地的同时，也刻意地贬低自己（以此赢得圣主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还得尊奉起一尊至高无上的神明。

这便是林氏风格的政治语言的“一石三鸟”之功！

可是，根据林彪的《101 笔记》看，那时的林彪对于彭德怀的私下评语却是：“他是正确的，可惜性子急了些。”而他对毛的评语则是：他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

——林彪的最为可怕处正在于此！对于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大是大非，他无不辨明得一清二楚。但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或曰，为了隐秘之政治目的，在公开场合中，他不惜完全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加罪于无辜者，颂圣于大过者。由此达到“得一人者得天下！（《101 笔记》语）”的政治目的（说林彪无野心，甚可疑！若无野心，何必如此地苦费心机？）。

此时的“政客林”已经把握精准了毛内心的深度焦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毛的刺激极大。他极为担心自己步斯大林的后尘，身后被党内军内的“赫鲁晓夫”们鞭尸。

笔者曾经困惑不解，为何林彪要给彭德怀扣上“冯玉祥”的“污名”？彭德怀的一生中从未像冯玉祥一般地在政治上善于投机变脸。直到书此文时才恍然醒悟，原来称其为“冯玉



祥”的潜台词是——你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要在毛的身后变脸鞭尸！这恰恰是毛的大忌！（若是直接称彭为赫鲁晓夫，那就太直浅了。岂不是将毛公开点明为中国的斯大林了吗？）

果然，他那用心极深的批彭保毛的言论，深得圣心，得到了皇恩浩荡的酬劳——毛授命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之职。

这时的林彪已是徒具“将军”外表，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政客”。军服，不过是他的“戏装”；军队，则是他长袖善舞出将入相的大舞台。

（笔者还认为，林彪在庐山上的批彭还夹杂有私念——他的妒功心理。抗战时期，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比林彪的“平型关之战”的规模和成果要大得多；在之后的国共决战中，林彪的战功又显然超过了彭德怀；再之后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又令林彪大为逊色，从此他淡出政局。不能不说，这是林彪的一种隐痛。庐山会议，让他出了这口憋气。）

## 二，为政治前景定向——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本来是一次总结“大跃进”所带来的大饥荒灾难的极其严重的历史教训、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引向比较健康的发展方向；也是为了让憋屈了好些年的各级干部“出出气”的、恢复党内民主气氛的一个大会。连那位造成巨大经济灾难、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始作俑者，也不得不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做了自我批评（是否真心实意，天知道）。

然而，“政客林”的一席发言，彻底逆转了整个会议的气氛，扭转了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引导全民族不可救药地滑向了万丈深渊。

他将饿殍遍野的大灾难，轻描淡写成“交学费”。为了一场“伟大的”政治理想（实验），几千万草民必须成为“小白鼠”；

他将这场人为性巨大灾难的主要制造者，塑造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将所有的错误（仅仅是“错误”吗？！）之因，归罪于各级干部——是他们没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

他将本应该彻底澄清的是“人祸”、还是“天灾”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巧妙地戾转为必须加强“党内团结”的党性问题。谁再纠缠于追究大饥荒的责任、谁再质疑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其罪甚重！

可以说，此时，林彪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功力，已经达到了《韩非子·说难篇》的至境：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

效果是明显的，他的高论令灰头土脸的圣上大喜过望。立即下旨，将林彪的讲话传达到全党！多么奇妙的君臣组合——“贤臣”极力地为圣君开脱罪责、歌功颂德；“明君”则极力地为爱卿频降皇恩、加官进爵。

崇高圣洁的“同志”关系，演化成了封建传统的“君臣”关系！

臣，视君为龙也：“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政客林”当之无愧地成就了此功！（韩非子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政客林”却没有。他的“成其说”，纯粹的为了私谋私欲。）

最高领袖保住了面子，中华民族则迷失了方向。

国防部长竟然大谈政治，真是历史的荒诞！

（1970年5月19日下午，林彪在毛家湾接见刚上任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及其它总政干部共14人时说：“我这个人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叶群马上插话说：“林彪同志十几岁的时候，就爱读政治理论书籍。”呵呵，极佳的注脚。）

从此，所有的中国人，都被这对君臣联手的“突出政治”绑架了！二位引领整个国家，不可救药地滑向了十年浩劫的深渊。

三，为政治神话定调——

自庐山会议至文革，“政客林”处心积虑地推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一系列“造神运动”——首先在军内大搞毛的“个人崇拜”：“学习雷锋”“毛主席语录”“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等——以此带动了全国人民的狂热豪情，达到了庄子所云的“举国皆狂”的疯癫状态。为文革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形象的说：文革前的中国，全民的精神状态已经如同一座巨大的干柴堆，林彪则是往上不断浇泼汽油的大祭司，最后只需伟大的酋长投下一根火柴棒，一场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便不可阻挡地轰然爆起……

1966年的“5·18”讲话，是“林氏腹稿”的巅峰之作。在这一次的长篇大论中（按照他的话说“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他的“政客林”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多年病恹恹的他忽而来了精神头，竟然一口气做完了篇幅超长的宏论。难怪有人称他是多年装病。我想，更可能是“权力激素”起的作用（权谋者多有此症——失去权力便病殃殃的；一旦大权在握，便精神矍铄）。

高明的大权术家，皆是天生的或是历练出来的“民众心理学家”。他们无不深知，愚众在渴求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明主宰自身命运的同时，还需要有一位恶魔。

神明，给民众带来的是幸福感、神圣感、安全感，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魔鬼，则用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怨气、不满、敌意和愤恨。

两种情绪成正比：崇拜的激情越是高昂，仇恨的豪情也就越是强烈。

他的发言，一上来，便制造出极具威慑力的恐怖气氛：“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他的高论，既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做了最佳的理论支持和渲染造势（又一次以他独有的“林氏风格”的语言，点明了毛“文革思想”的精要处——如：“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真是提纲挈领、切中要害！）。

同时，也极其有效地煽动起了“革命群众”的燎原激情——将“反革命”描绘得极其凶险，无数革命者的头颅随时都可能落地。危在旦夕迫在眉睫！“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他还详细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几十次各种各样的政变实例。

其实，他非常清楚，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自己不过是在制造一大批的政治“假想敌”，一是可以投好最高领袖的危机心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窃听门事件、彭德怀万言书、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都令毛多年来心头不宁，总是担忧有人想取而代之）；二是“为了打鬼借道钟馗”，借毛与“革命群众”之手，除掉宿仇（如陆定一夫妇）新怨（如罗瑞卿）。

也就在这篇大论中，林彪终于将“伟大领袖”供奉上了神坛！“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他们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丙、对林彪一生的总评

冷观林彪一生的作为与终局，可以说，他非常透彻地领悟了龙文化中老熟的“阴谋之术”，并且玩弄得出神入化。不仅在红色共运的历史上独占翘楚，就是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也无人能敌。相比之下，赵高、富歇、贝利亚之流皆小巫哉！

“政客林”不惜人格的堕落——自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庄子所深讽的“舔痔者”。

“痔”，隐疾也，难以示人也。一旦发作，只能默而忍之；“舔痔者”，善于患者愁苦难言之际，以柔软之舌舔弄之、缓解之、慰疗之。痔之在人，为生理之疾。甘当舔痔者，古今罕闻；痔之在君（乃至王朝、帝国），则为人格之痔、恶习之痔、体制之痔、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之痔；为其甘当“舔痔者”则历朝历代多如过江之卿矣。

林彪，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古今中外“舔痔者”中之佼佼者！

——领袖的难言之欲，他纵容之（毛好大喜功，林誉之为“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领袖的难言之愧，他抚慰之（“三面红旗”的严重恶果令毛在党内名望大损，林便将罪责推到群臣头上）；领袖的难言之忿，林即绝灭之（毛总是耿耿于怀曾经在历史上“得罪”过他的老同志，如彭德怀、刘少奇等，林便善体圣意地落井下石）；领袖的难言之忌，林即诋毁之（毛难以容忍大权旁落，林便宣称对任何挑战毛者，“全党共诛之、共讨之”）。

正是凭借着“5·18讲话”，林彪达到了其政客生涯的“极”峰：

——毛被供上了神坛的“至尊”地位，脑门后罩上了“四个伟大”“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当代最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天才”等圣洁光圈；

——林彪自个也攀龙附凤地高踞于“半神”的神龛，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林副统帅”，成为了伟大领袖的“法定”（“钦定”）“接班人”；

——“文革”，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五洲四海一片红”，“革命群众”的绝对忠诚、狂热崇拜……

一切都已经无以复加，一切都已经“登峰造极”矣。依东方先人的智慧来看——“物极必反”的时辰该到来了。

可是在“东方智慧”上，他却是一个低能儿——既没有灵通先哲“天网恢恢”“天道好还”“物壮则老”“天道忌盈，鬼神害盈”的真谛；也没能领会《红楼梦》的启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毛好让他的老部下阅《红楼梦》。可是有几人真正读懂了？毛本人读懂了吗？）

反被“聪明累”的林彪跌入了自个儿亲手打造的“林氏悖论”中，难以自拔——他越是要吹捧最高领袖，便越得到圣君的信任与重用；受宠的他便越得殚精竭力地塑造领袖的大神话；于是，越得到至尊的依赖和恩宠，他的地位便越是高升，他便越是没有退路！直至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他也就越加体会到“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的苦涩滋味……人的心境与活法也就越发地晦暗惨淡（参考张宁、杜修贤的有关回忆文章）。

（就连他的一家人，也毁于“林氏悖论”下：当林立果要求鲁珉驾机炸毁毛的专列、而后者借“眼疾”逃避时，当林立果告知姐姐他的谋杀与叛逃计划、反被林豆豆告发时，当贴身秘书李文普拒绝随车同林家三人仓皇逃命时，他一一品尝到了“毛神话”的巨大威力——这可是他一手缔造的啊！）

这等异常的君臣关系，早晚会演化成一场可怕的大裂变。

也是一种宿命：1959年的庐山会议，“政客林”华丽登场；1970年的庐山会议，则到了他黯然谢幕的时辰。可是，“上场容易下场难”——既然你是在腥风血雨中登台亮相赢得喝彩的；那么，到了你退场时，又怎么会是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呢？

1970年9月—1971年9月间，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局，正在最高层极为隐秘地发酵酝酿，步步惊心地向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终局。

此一阶段，林彪与领袖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发展到了君臣之间的“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杨权篇》”。而全国人民、全世界政要与情报系统，则无不蒙在鼓里。就是那几位当事人，也无法预料到其极具戏剧性的震撼性结局。

所以，1971年9月13日的温都尔汗的一声爆炸，令举国震惊举世愕然！

若干年来，毛与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被庞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渲染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最完美最最圣洁的一对人事组合了。一提起毛与林，激情澎湃的中国人民便会立马联想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或者联想到圣父与圣子——一位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另一位是“最善于活学活用者”；一位是“最英明的导师”，另一位是“最好的学生”；一位是“最杰出的战略统帅”，另一位是“最优秀的军事将领”；一位是“最最伟大革命事业的开创者”，另一位是“最最忠诚可靠的接班人”；一位“万寿无疆”，另一位“永远健康”！（“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101笔记》语。林彪同志倒真是言行一致，立竿见影）。

哇塞！还有比这样一对圣君贤臣的组合更加“亲密无间”“纯洁无暇”“完美无缺”的了吗？

谁知转瞬间，一位成为了“更加英明睿智的领袖（早已洞悉了“亲密战友”的诡计）”，另一位则成为了“十恶不赦的政变者”；一位一向“光明正大”，另一位则历来善于“搞阴谋诡计”；一位专“搞马列主义”，另一位则专“搞修正主义”；一位依然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另一位则成为了令人不齿的“大卖国贼”！

红色“圣父圣子（圣师圣徒）”间，原来是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冤家仇敌！

可怜的中国人民啊，情何以堪？智何以堪！？

就连“万寿无疆”的毛老人家，也彻底地垮掉了。多年来，毛始终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与驾驭“娃娃之将”林彪。无论从体魄、气魄上，还是从名望和雄才大略上观，毛都无可置疑地压倒林彪。在伟岸的“红太阳”跟前，孱弱的林彪也只能扮演“学生”“弟子”“爱将”“忠仆”“佞臣”的角色（1966年8月8日，林彪就曾单膝跪伏于毛的脚下）。所以每到毛政治生涯与军事部署上有难题时，便会想到并重用这位可靠的老部下。尤其是清除彭德怀、打倒刘少奇和发动“文革”，都得到这位亲信的鼎力相助。“好学生”总是能入骨入髓地领悟领袖的政治意图与思想奥义，并且事半功倍地身体力行。

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后，虽然“最高领袖”对这位大弟子有所不满和警惕，但也未料到林家父子的下手之狠、胆量之大。“9·13”那夜的“伟大领袖”，才惊愕地发现：自己早被玩弄于“林副统帅”之掌中矣！

故而，林家人的谋杀与叛逃，给予了毛致命性的打击——“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他，一夜间衰败成老朽不堪的风烛残年状，精神恍惚，焦躁不安，惊惧难眠（见张玉凤、姚文元、毛警卫员的有关回忆文章）。

历史的吊诡，如此奇特！林氏父子以生命为代价，玩了一场“歪打正着”的政治游戏：

“571工程纪要”终结了“四个伟大”的神话——林彪别有用心创建的“领袖神坛”，偏偏毁在了其“虎子”的一纸笔墨下（“纪要”中，将“红太阳”描绘成了“当代秦始皇”。此语出自林氏父子之口，与出自党外“右派”知识分子之口，意义完全不同，效果也完全不一样）！

“9·13事件”则终结了“文革”的神话——“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竟然是一场欺天瞒地荼毒苍生的荒唐梦！

“政客林”下的赌注太大了！他玩了一系列“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推波助澜”的政治赌博。却忘了，纣也会灭“助虐者”、虎也会噬“作伥者”、狂涛也会溺死“助澜者”！

其实，真正灭掉林彪的是他自己！

这便是先哲所启迪的——“机心深者祸亦深”“自作孽不可活”“阴谋人者，其祸必复”（他扣在“假想敌”头上的种种不实罪名，最终都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自个的脑门上；并且落了个“全党共讨之、共诛之”的下场）！恰如俗谚所云的“玩火者自焚”——回想一下前文的“干柴烈火”之喻。这场大火恶果，是中华文明的遍地焦土、人伦人格的扭曲变态、一代学人的青春荒废、千万家庭的家破人亡；直到有一天将所有的玩火者（林彪无愧是第一大玩家）搭将进去，一同火葬！

纵观林彪“从将军到政客”的一生，笔者不得不做出一个残酷的结论：“敬爱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是你最为恰当的结局。因为你用心良苦所制造的“狂热崇拜”过于荒诞了！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浩劫过于惨重了！你不以这等十分酷烈的惨死谢罪于天下、惊醒于世人，难道还会以其它“温良恭俭让”的曼妙方式驾鹤西去吗？

“9·13爆炸”，对林氏一家人而言，是一场悲剧；对“文革热梦”的幻灭而言，则是一场喜剧；对于终于觉醒的一代中国人而言，则成为一场正剧。

这一回，伟大领袖丢失了面子，中华民族则开始了寻找新的方向。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何其的缤纷多彩、复杂诡异、残忍无情！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定型的、延续的。

“将军林”早已死去（精神先于肉体死掉），“政客林”的幽灵则存活了下来。依然生机盎然、薪火相传。想想那位玩出“重庆模式”的后起之秀，他的所作所为与“林副统帅”何其相似——同样地压根不信什么神圣的“红色教义”，却引领狂热的民众喧嚣一时；同样地用众无辜者的头颅为他们的政治野心祭旗；连两者的结局也何其相似，在极具戏剧性的戾转之间，身败名裂，一家灭门、一家锒铛入狱！

自两千年前鬼谷子、韩非子之辈横空出世，同样的政治诡谋、政治冒险与政治游戏，便代代相传，香火旺盛。

只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的觉醒和质变，此一类的诡谋与枭雄，才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环视当今的官场与民间，衮衮诸公携草芥小民，大多崇奉鬼、韩之术（“厚黑学”）为“金匮秘笈”，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不言而喻。

已死的、已囚的，未死的、未囚的大小“政客”们，继续玩你们的谋略心术吧。

笔者只想独自吟诵《红楼梦》〔聪明累〕一曲：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我想，黄泉之下与囹圄之内的那两位极品政客，再吟此曲，应该是回味无穷的……

2 0 1 5 • 4 • 2 1，2 0 1 5 • 6 • 3 南京九华山下

□ 原载共识网

~~~~~

【劫后反思】

“九一三”使神话破灭

• 廖振旅 •

（廖振旅，退休干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5岁，是中共湖南省资兴县委办公室干部，因文革中参加造反派而受到审查、批斗，正被安排在资兴县杨洞水库工程指挥部做临时工作。）

◇ 震惊

文革期间，我在湖南资兴县杨洞水库工程指挥部做过三年半临时工作，给全县成千上万修水库的农民和工程专业队编印《工地战报》。1971年冬的某一天，我将一期战报稿编成了，打算交给那位“摘帽右派”刻写油印分发。这时，指挥长（也是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来了，他指着稿件扉页上的毛语录和林语录，悄悄地对我说：“林彪语录就不要用了！”

我猛然一惊！脑海里立即跳出一个念头：“林彪出问题了！”当时，林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写在“九大”的党章上。文革前期的几年中，每逢开会、作报告、写文章，都必须严格遵守一种程式：呼喊毛“万寿无疆”后，一定得紧接着呼喊祝林“永远健康”；引用了毛语录后，一定得接引林语录。否则就会被指责对毛为首、林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是最可怕的政治错误。如果不是林出了问题，怎么可能不用他的语录？

当时的我，身份是灰黑色的。在全县所有挨整靠边的大小干部几乎全都定了单位重新工作后，我却仍挂在“五七干校”，在水库工地做临时工。尽管如此，指挥长几年中却对我甚是友好和信任。于是，我敢于轻声问他：“林彪出了什么问题，能告诉吗？”指挥长说：“现在还保密在党内领导干部。可以告诉你一个人。林彪坐飞机出逃投敌，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了。”

这话给我极大的震惊！如果事先让我来猜估，即使再好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林彪已成为“敌人”、得到“死亡”这样的下场！一段时间以来，报纸、电台都没有林的报道，尤其是1971年国庆的报纸上竟无林的照片和消息，我早觉怪异。如果思维独立、正常，是不难做出大体推断的。就因为我思想封闭，迷信毛林，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便绝没想过林会出事，而且出这样震惊天下的大事！

◇ 破灭

以前，我这人想事情、看问题都受头脑中条条框框的限制，总体是以党和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如果认识上有不一致，一定要检查自己，责怪自己水平低。这些条条框框不是固有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领袖和政治精英们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反复多年塞进来的。林彪之死粉碎了我头脑中的条条框框，奇迹般地引发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原来看问题所站立的平台基础被动摇了甚至摧垮了。尤其是在看到中共中央经毛批示发出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以后，读过“十大”文件特别是周恩来批林的政治报告以后，我激发一系列的思考，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概括最重要的，是思想上逐步出现了三个“破灭”——

① 林彪神话的破灭。

早在抗战胜利初期读初小时，我就听到过林彪的传说。说他头上长有比铜板还大的一丛红毛，勇敢善战，有次只身被众多敌人包围，竟从敌头顶上飞越突围而去，带回人马来了一个反包围。林彪的战史是传奇性的。在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1959年更引我注目。出于对毛的迷信和崇拜，我对林彪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不遗余力的造神运作，曾为之赞佩。定为接班人，我曾认为非林莫属，由衷拥护，深信是国家民族之福。文革中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矛头指向毛、林者即反革命。对这种特别的暴力保护，我也觉得应该。

“九一三”把林彪的一切都毁了。“九大”党章赞扬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位高权重的周恩来，在“九大”发言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赞扬林彪的，甚至说出因为有了林彪而使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感到很大幸福”的肉麻话。“九一三”一夜之后，林彪的面目全非。林的头上，是他那将要接班掌舵的党，给他扫除了全部神圣光环，加上了丑陋和邪恶。从此，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对林的美好愿境全都消失。

驾机出逃，体现出林对毛的硬顶、绝望和绝交。拿几年造神中林赞扬毛的话，尤其是著名的毛语录本《再版前言》、“九大”政治报告和几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讲话加以对照，足见林对毛心口不一。公开说的、写的那些，都是假的。毛、林之间，实际上相互都不真正承认是什么“亲密战友”，而是君臣关系。联想起文革前期的几年中，林除了大会宣读毛审阅同意的稿子外，对其他实质问题都是毛表态则自己跟着，没有表现过对文革的积极主动关照。林、陈商谈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重点不谈文革、大谈生产建设。林对江、张等文革派不乏反感，其几大干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结伙批张。很明显，林对文革的评价决不会像纸上印的那样肯定。可见，林为人处事也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面”。

林彪为何要驾机外逃？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林称得上是智勇双全的人，每战必先对敌我态势了如指掌。他不会不明白，即使成功逃到国外，也无有可供利用的国际国内力量，不可能卷土重来，注定没有希望。下场既如此清晰还要外逃，就只有一种解释：林恐惧已极，唯求保命。也许林已看到刘少奇、贺龙诸人的惨死，不甘心束手受缚，凌辱毙命。但只要是外逃，就是下下策。而且又摔死，正如毛说的是“帮了大忙”，能被轻松地安上无可分辩的罪名，顺当地被处理掉。一代军事名将，并没能英雄到底，终归演出了当代的一场大悲剧。

② 毛泽东神话的破灭。

以前读党史、现代国史，也就等同于读毛泽东的胜利史；谈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成就，都会说成是毛领导的结果；看未来，人们把美好希望全都寄托在毛的身上。毛的著作家家都有，毛的语录人人能背。全党全国全民对毛的赞颂之词无以复加。我印象最深的词是毛“英明伟大”、“战无不胜”、“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毛在我思想上曾是不受质疑的神圣人物。

这下子，由毛亲自选定、树立、确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唯一副主席、天天由全党全军全民呼喊、赞颂、祝愿的林彪，突然被定为叛徒、卖国贼、反革命。我很自然地想到：林出问题有毛的错。从井冈山起，林就一直跟着毛，历经四十几年，是毛一步步地亲自把林提到仅次于他本人的地位。追问责任，毛应该是咎无可辞。

同是接班人，林彪与刘少奇大不同。林是“九大”写在党章上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九大”选的、也是毛拍板定的党的唯一副主席。林受到的赞颂、崇拜是空前的（也可以肯定是绝后的），除毛之外，任何党政军领导人望尘莫及。这些都是“七大”以来当了20多年“接班人”和“二把手”的刘少奇没法比的。如此受到毛倚重的林，“九大”闭幕仅仅两年又四个多月就身败名裂，无疑是对毛的最大嘲弄和打击。

中共中央1973年8月30日批准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列举了林曾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追随王明路线、伙同彭德怀要夺毛的权、抗日时吹捧蒋介石、拒绝到朝鲜作战等等一系列历史罪证。这些罪证，件件都是毛早就知道了的，从来没当作问题，从来没妨碍过林的节节上升。既然报告明示林的叛党叛国，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长时期的历史性的，也就彰显了毛对林是长时期的既失察又失策。

对林的处置，毛也不够公正、磊落。最明显的是毛在南巡中拉来一批省市委书记、革委主任和军区司令、政委，背着林揭林的盖子，制造舆论，凝结队伍，宣告要在三中全会上倒林。党主席如此对待唯一的副主席，违背了毛主张的、党章上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不符合毛规定全党必须遵从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几次咄咄逼人的讲话，无异敲山震虎，对林的出逃显然起了迫促的作用。可见，毛林分裂，不是林一方的责任。

至此，即在毛死前，我曾深度迷信、从无怀疑的毛，就被我认定：并不那样英明伟大，并非战无不胜，谈不上洞察一切，更不是句句真理。毛也有常人的特点，有不正确的一面，说的、做的，同样可以而且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③ 党神话的破灭。

对党的神化同神化毛是紧紧连在一块的。经典的词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有多年固定的词语，说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我同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曾经深信党的神圣。它无比正确，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对它只能颂扬，不许批评；只能服从，不许疑问。

林彪的突变引起我对毛泽东有了质疑，也就必然引起对党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党是用毛思想武装的，党就是毛，毛就是党，党、毛一体。最大的看法改变是，党并非一贯正确，而是常有失误；党并非不断胜利，而是饱受挫折；党并不只讲真话，而是常讲假话；党并非那样英明，而是需要群众监督。

从林事件中，我得到了最初的启示。

九届二中全会曾经发出公报，向全体党员、全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宣称，“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看了专述这次全会“林陈反党集团”活动的中央材料之一就明白了，全会的真相并非如此。

林彪集团的垮台，7名政治局委员成了反革命，超过政治局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八百多名军级以上干部遭整肃，坐牢、判刑、挨处分。他们都是这个党的党员，是党中央和高级单位党组织领导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九一三”发生不到两年召开“十大”时，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宣布，“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个党“没有被分裂”，而是“更加壮大”。

联想起此前历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一批批党的领导成员和党员垮了，分裂了。我便想打个比方：党好像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内部，不断发生了吵架、斗殴，不断有成员病了，伤了，逃了，死了——这些，难道都是不需要承认的事实吗？都是“更加壮大”的标志吗？都是值得夸耀的“最大胜利”吗？

以上说的三个破灭，破灭的只是“神话”，即那些脱离客观实际的假相。对党、毛、林，我不主张全盘否定，更无恶意贬损。相反，三者都有许多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都是研究国情和历史的宝贵资源，只是本文未能道及罢了。。

◇ 真相

有关林、陈和黄吴叶李邱，我还有难解的众多疑惑，许多真相还锁在国家有关档案中。陈和吴、李、邱各自的回忆录展现了不少的过程和细节，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作为当事人，免不了主观性和局限性。因此，有些结论已有事实依据，有些问题就只能是分析、推测，有些死结看来永远无法解开了。

庐山全会上是否真有“反革命政变”？我看是整人的借口而已。说有天才，称赞毛是天才，印了几条马列谈天才的语录，怎么就成了林“反党夺权”的“理论纲领”？这类话其实众多大人物早就在各种会议上、文章中说过写过多少次、多少年了，这次无非是在宪法草案讨论中出现了争论引起重新肯定而已。设不设国家主席，也是宪法修改讨论中的话题。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70年部分，明白记载着：8月22日，即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的政治局5人常委会上，除毛外，林、陈、周、康4人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并且要实行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一元化，即由毛任国家主席。此前，林已表态，他不能任国家主席或副主席。但“设国家主席”还是被说成是林“反党夺权”的“政治纲领”。更为吊诡的是，

常委康生在全会上赞同林称天才的讲话，也赞成设国家主席，汪东兴更是慷慨激昂发言赞同并领头要揪张，两人却平安无事。很明显，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说成是“纲领”，不过是制造先倒陈再倒林的武器弹药而已。

毛为何要倒林？我看是毛为了保文革、保自己。毛自认一生最得意的是两件事，这后一件就是文革，强调要“七八年来一次”。毛自知赞成文革的人不多，怨气很大，也就对江、张等“志同道合”的文革派看得很重，对可能翻文革案的“中国赫鲁晓夫”特别警觉和痛恨。陈和林的几员干将在全会上要揪张，毛很自然地认为矛头是对自己而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明显是为陈和几员干将撑腰的。加上此前林、陈商定的九大政治报告主题并非无意地忽视了文革，毛必然看出他的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绝无可能支持他的文革伟业，他绝不愿做被鞭尸的“中国斯大林”。至此，倒林就成为毛不可逆转的决策了。

黄吴李邱想不通，为何反江、张却同江、张一道受审挨判？他们还想不通，文革中，毛、周整大人物分别被认为只是“错误”和“违心”，他们跟着帮了忙和整了小人物却是“罪恶”？应该说，凡文革中做帮凶整人，肯定是犯罪，黄吴李邱都是加害者，是罪犯。他们的“冤枉”只是在同毛、周比照时才显露出来的。毛是文革的总策划、总指挥，周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和专整高干的专案组总负责人，是文革的主要支持者、执行者。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那些事，除被指控却无实据的林“政变”、“谋杀”罪外，几乎无不在此二人的掌控中。为何这两人能超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之外？只能归结两个原因：一是“不反皇帝”的“忠君”文化传统，毛是党主，是君王，反毛即反党；一是复位官僚集团重掌大权的需要。官僚集团将毛、周同文革罪责划分开是为了保住革命领袖的光环。文革必须否定，不否定不能为自己雪冤、解气、正名；革命领袖不能否定，这是他们重掌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审林、江集团可以为文革抵罪，保毛、周可以为复位者撑腰。这就是法律为政治服务——民主国家坚守法治不会出现，专制国家崇尚人治必然如此。

2011.5.5

□ 原载《民间历史》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